

《欧洲社会学评论》2007 年 刊文概述

社会
2009 · 5
Society
第 29 卷

赵蕊

2007 年《欧洲社会学评论》出版了 5 期,共刊登了 46 篇文章。文章大多以欧洲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涉及劳动问题、教育问题、婚姻家庭、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福利保障、社会统计学、社会交往、性别问题、消费、贫困和社区建设,此外还有对经典著作的评述。从文章在各个研究领域的分布数量来看,欧洲社会学界对于某些研究领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对某些比较冷门的研究话题,也不乏新颖的建树。

《欧洲社会学评论》2007 年刊登的文章大致可以归纳为七大类,下文将对各个部分的文章作一梳理。

一、劳动问题研究

1. “Levels and Patterns of Material Deprivation in Ireland: After the ‘Celtic Tiger’” (《爱尔兰原料剥夺的程度和模式:“凯尔特虎”时期之后》,第 2 期), Christopher T. Whelan & Bertrand Maitre。作者运用欧盟关于收入和生存条件调查统计中爱尔兰部分的第一次大波动的数据,评价了爱尔兰在“凯尔特虎”时期之后,原材料剥夺的水平和模式方面的矛盾解释。爱尔兰经济政策的激进批评者把爱尔兰的个案看作“全球化趋势中对经济的忽视”的一个非常好的例证。作者以多维的视角确定了:1/15 的人口在经济方面易受到打击,1/14 的人口受到了最大剥夺,这说明了在生活方式上受到的剥夺是高风险的。作者认为,目前原材料剥夺的水平和深度,比激进主义分子提出的爱尔兰经济全球化的思想更加合适。

2. “The Sex Wage Gap in Japan and Sweden: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Workplace Sex Composition, and Family Responsibility”(《日本

和瑞典的性别薪酬差异:人力资本、工作场所性别构成和家庭责任的作用》,第2期),Johanna Kumlin。文章使用最新全国性调查的个人数据,通过关注人力资本、工作场所性别构成和家庭责任的重要性,分析了瑞典和日本社会中薪酬性别差异的来源。作者认为,由于这两个国家在性别政策和性别构成方面的差异非常大,因而对比这两个发达国家薪酬中性别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就显得十分有意思。结果显示,日本的人力资本因素和妇女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在对于薪酬性别差异的解释上,比瑞典更有说服力。两个国家中,都有三分之二的薪酬性别差异归因于解释变量的平均收益率的性别差异。

3. “Does it Work? The Effect of Continuing Training on Labour Market Outcom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Germany, Denmark, and the United Kingdom”(《那会奏效吗?继续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效用:一项来自德国、丹麦和英国的比较研究》),第3期),Martina Dieckhoff。研究对德国、丹麦和英国劳动力市场上成年人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效果进行了调查。作者假设培训成果在各个国家之间是不一样的,这种异质性应该归因于制度上的差异,即制度差异影响培训的质量。利用欧洲社会家庭的追踪调查数据,文章分析了三个问题,即再培训降低了多少失业的风险、培训是否能增加失业人员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培训是否增加职业流动性。结果显示,培训的影响在三个国家间存在差异。

4. “Lost in Transition? Labour Market Entry Sequences of School Leavers in Europe”(《在转型中迷失?欧洲劳动力市场进军中学毕业生序列》,第4期),Christian Brzinsky-Fay。作者认为,从学校到工作的转变不仅是一个个体事件,而是在个体间和国家间都有所区别的一个转变的过程。作者运用最优匹配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对欧洲十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进入中学毕业生队伍的过程状况进行了检验。通过跟踪调查毕业生,每月调查一次劳动力市场的状况,观察了五年间劳动力市场的进入过程。作者根据 Sackmann 和 Wingens 的类型学理论定义了8种序列类型,用它们在国家间的分布来检验 Marsden 和 Gangl 等人描述的国家分级,这一分级更具解释力。最后,作者将从学校到工作的转变过程的好坏,用一系列具有波动性和综合能力的指标来描述。研究指出了制定了良好培训系统的国家具有的不稳定性,以及实施以普通教育为主的国家具有的综合潜能。

二、教育问题研究

1. “How Much Does Education Matter and Why?”(《教育有多重要, 且为何重要?》, 第 1 期), Rolf K. W. van der Velden & Maarten H. J. Wolbers。研究探索了荷兰接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的离校就业者, 所受的教育对社会经济成果的总体影响(可测量和不可测量的)。经验分析显示, 教育的影响在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被明显地低估了。通过研究可见, 教育对于所有的产出都有着很大的影响。除了教育水平, 教育程序的选择也影响着社会经济产出, 虽然后者的影响只在私营部门具有重要意义。学校的差别对于薪资和职业安全没有什么影响, 但这些差别对于雇用机会却有广泛的影响。

2. “Vocational Upper-Secondary Educ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School”(《职业高中教育与学校转型》, 第 1 期), Cristina Iannelli & David Raffe。文章提出, 一是职业高中毕业的年轻人与普通高中毕业生相比, 在就业方面是否更有成功的转变? 二是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职业教育是否有系统性的区别? 作者区分了两种理想的转换系统, 一种是基于职业教育与雇佣之间的连接强度, 一种是分别由“雇用逻辑”和“教育逻辑”所支配。作者假设职业影响在以职业逻辑为主导的系统中会更强大, 然后用对荷兰(代表职业逻辑)、苏格兰(代表教育逻辑)、爱尔兰和瑞典(代表中间情况)毕业生的调查数据, 检验了这一假设和其他基于这一理想类型的假设。基于数据的可比性, 这些理想类型被广泛支持。

3. “Scarcity and Abundance: Reconciling Trends in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on Social Class and Earnings in Great Britain 1972 - 2003”(《匮乏与充裕: 英国教育对于社会阶层和收入影响的调和趋势, 1972 ~ 2003》, 第 2 期), Herman G. van de Werfhorst。文章分析了英国教育对职业成果影响的趋势, 并指出, 这一趋势的方向和强度在社会阶层和收入之间有所区别。在社会阶层方面, 教育影响力的趋势无疑是下降的, 但在收入方面, 在 70 年代是下降的, 在 80 年代持平, 到 90 年代则稍微增长。这种趋势符合 L 型曲线或者 U 型曲线, 依赖于相比较的限制水平。中产阶级在工作种类上日益分化, 这使得教育和阶级之间增长的功能匹配很难显现出来, 而收入在供求方面的变化上很容易适应。但

收入的分化正在阶级之间增长,那么教育影响收入的趋势,部分地受到增长的雇佣关系差异的影响。

4. “Explaining Educational Decision and Effects of Families’ Social Class Position: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Breen-Goldthorpe Model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基于家庭社会地位的教育决策和作用分析:一项关于布里恩-戈德索普教育获得模型的经验研究》,第4期), Volker Stocke。研究检验了布里恩-戈德索普模型(Breen-Goldthorpe Model)是否能有效地预测教育决策并解释个人是如何受社会阶层影响的,并使用了德国为孩子做好中学教育决策家庭的同组研究数据。首先,作者分析了不同阶层的消费、成功率和维护地位的回报(家长与教育选择的关系)之间的差异是否由家庭客观条件的差异造成的。与理论期望一致,研究者发现,阶层可以通过“可用经济资源和孩子的学术能力”影响父母的主观信念和估计。其次,作者检验了对中学的选择与阶层的影响是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然而结果是,对于孩子有多大可能性完成学业的信念和维持家庭社会地位的动机,对于教育决策起着重要的作用,与教育投资的预期成本却没多大关系。与预测相矛盾的是,社会阶层对于教育决策的直接影响并不能够被理论上的因素所解释。

三、婚姻、家庭、生育和性别研究

1. “Contacts between Divorced and Non-Divorced Parents and Their Adult Children in the Netherlands: An Investment Perspective”(《荷兰离婚/非离婚父母与其成年子女的关系:从投入的视角分析》,第2期), Paul M. de Graaf & Tineke Fokkema。作者对离婚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接触频率进行了描述性和解释性的研究。1998年荷兰离婚调查数据显示,离婚父亲与未离婚父亲相比,与其成年子女的接触较少,而母亲在这方面的影响则不明显。为了解释父亲较母亲表现出的相对较低的接触频率,以及离婚/未离婚父亲与子女接触频率的不同,作者使用了投入的概念。他定义了5项投入因素,即在婚姻中的抚养参与度、监护的安排、离婚前后的冲突、赡养费的给付和是否建立新家庭。离婚对于接触频率的影响一般可以用监护权的安排来解释。在离婚者中,监护权的安排和再婚状况都能用来解释接触频率,但从父亲或母亲的角度看,这一影响度是相等的。很少有证据显示,婚姻中的抚养参与度、

父母冲突和赡养费的给付等,对于接触频率有直接影响。

2. “Couples’ Places of Meeting in Late 20th Century Britain: Class, Continuity and Change” (《20 世纪后期英国夫妇的约会地点:社会地位、连续性和变化》,第 3 期),Richard Lampard。作者运用 Bozon 和 Heran 创立的类型学方法,调查了 20 世纪后期英国夫妇约会的地点和环境。连续性和变化同样惊人,社会网络维持了约会地点重要性的一致水平;但是在约会地点的变化趋势上,在学习和工作场所见面取代了在公共场所饮食和社交。这些趋势与其说反映了个人主义和自我认同的影响,不如说反映了人们日常生活环境的改变。社会阶层与在公共场所约会的可能性的相关性越来越高,较之于别的地方,英国则更普遍。一些特征,尤其是职业地位,比父母的阶层地位有更大的影响力。在职业地位范畴内,不同约会地点的分化似乎反映了阶层在环境方面的同质性水平,对个人主义和同质性规范的影响较小。约会地点的地区差异突显了结构因素的重要性,如社交性或文化结构的模式。

3. “Changing Resources 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work: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Swedish Couples” (《改变家务劳动中的资源和分工:一项瑞典夫妇的纵向研究》,第 4 期),Marie Evertsson & Magnus Nermo。研究关注配偶的相关资源和家务的改变方式。作者关注的问题是,配偶是否会在家务分工的谈判中使用自己的相关资源。据瑞典生活水平调查分析显示,1991 年至 2000 年间,配偶中相对资源的变化,会导致妇女的家务负担发生相应的改变。这些改变说明,如果妇女的相对资源,如教育水平、社会地位增长,那么她们的家务负担则会减少。如果妇女对于配偶的经济依赖减少,她们的家务负担也会减少。妇女家务负担的减轻主要是由于男人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增多了。然而,如果不考虑资源的因素,瑞典男人做的家务比女人少。

4. “Economic Inequality in and outside of Marriage: Individual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婚姻内外的经济不平等:个体资源和制度背景》,第 5 期),Carrie Yodanis & Sean Lauer。他们运用 15 个国家的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关注国家层面的经济不平等及其对夫妻在管理财产上是否平等的适度影响。在确认先行研究和理论的情况下,作者发现性别语境对此有影响。研究结果还表明,在一个国家中,经济不平等的所有层面都会影响婚内财产管理的平等与否。经济不平等有

3个测量标准:国民收入不平等、社会工程上的政府开支和对于不平等的意识形态支持,这些都与夫妻如何管理财产明显相关。在一种支持和实践经济不平等的语境中,夫妇本身也更可能实行经济不平等。

5. “The First Cut is the Deepest? The Role of the Relationship Career for Union Formation”(《第一刀伤得最深? 结合中以往亲密关系的影响》,第5期), Anne-Rigt Poortman。研究运用荷兰1998年的离婚调查数据,检验了关系史对结合变化的影响。未发现异质性的脆弱模型表明了,先前的结合经历减少了后来结合过程的变化。此外,先前结过婚的人与未婚同居的人相比,进入一段新的结合关系的可能性较小,曾经有多次短期共同生活或者有孩子的人也是如此。研究还指出,如第一刀会伤得最深,结合的可能性随着第一次结合解散而直降,但在之后的分手之后,这种可能性就比较稳定了。最后,研究发现,在以往亲密关系对后续关系的影响上,女人受到的影响程度比男人大。

6. “When Fertility is Bargained: Second Births in Denmark and Spain”(《当生育成为协议:丹麦和西班牙的第二胎》,第5期), Stefanie Brodmann, Gosta Esping-Andersen & Maia Guell。研究检验了一种观点:妇女的生育决策取决于在照顾孩子方面更大的性别平等。作者分析了第二胎的问题,特别关注父亲照料对于职业妇女的重要性。作者使用欧洲社区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事件史的技术,比较了丹麦和西班牙在生育情况和对职业母亲的公众支持两方面的差异。与西班牙的个案相比,丹麦妇女更有可能生育第二胎,主要是因为福利状况的支持使得母亲职责和职业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调查显示,丹麦的职业妇女还可能通过夫妻协商从而增加父亲的照料,以减少她们母亲角色的机会成本。

7. “Value of Children and the Framing of Fertility: Results from a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Survey in 10 Societies”(《孩子的价值与生育框架:一项来自十个国家的跨文化比较的结果》,第5期), Bernhard Nauck。作者指出,为了更好地解释生育行为的跨文化差异,三个补充的路径是有系统的相关的:基于需求的经济理论(ETF)、基于供给的“孩子的价值”的修正理论(社会产品功能的普通社会学理论中比较特殊的一种理论 VOC),以及变量合理性的框架理论。作者建立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模型,来说明出于身体状况最优和父母的社会尊重而要孩

子的变量合理性,以及生育决策的变量合理性。作者比较了十个国家(中国、印度、印尼、南非、加纳、以色列、巴勒斯坦、土耳其、捷克和德国)的 VOC 信息和妇女的生育情况,运用了以生育情况为因变量的多变量模型。作为只存在于社会内部的 ETF 和 VOC 试验研究,跨国的联合检验在生育研究中有所超越。结果证明了模型的跨文化有效性,对生育的系统影响,以及在人口过渡期生育决策的变化合理性。

8. “Gendered Transition: Post-Soviet Trends in Gender Wage Inequality among Young Full-Time Workers”(《性别化转型:后苏联年轻全职工人薪酬性别不平等的趋势,第 2 期》),Denis Trapido。作者以线性回归为分析工具,运用前苏联 4 个地区全职工人的早期职业的纵向数据,解释了“苏联解体之后,市场经济的转型如何打破了薪酬的性别平等,这一改变又是一个怎样过程”。文章提出,在 1990 年代中期的 4、5 年间,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男性比女性更明显地提升了薪酬等级。相反的情况发生在苏联的斯沃尔德洛夫斯克地区和乌克兰的哈格岛地区。作者认为,无论性别薪酬差异增加还是减少,以性别区隔的职业和部门中的薪酬变动是形成薪酬性别阶层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市场经济转换下劳动力改组的不成比例,则导致了男性或女性在某行业或部门中的收入减少。家庭因素导致的收入差别效应并不能够解释薪酬变动的性别差异。另外,薪酬期望中,性别差异的影响很小。

9. “Beliefs about Women’s Labour in the Reunified Germany, 1991 – 2004”(《再统一后德国社会中的女性劳动力的观念,1991~2004》,第 4 期),Kristen S. Lee, Duane F. Alwin & Paula A. Tufis。文章涉及东西德统一后性别观念的改变机制。作者研究了同期群替代和同期群内部的改变是如何影响了性别意识的改变和妇女工作以养家糊口为目的(1982~2004 在前西德,1991~2004 在前东德)的现象。作者发现,当西德的群组更替和群组内部的性别观念发生改变,东德首先在群组内发生改变。教育和就业水平的不同对于性别观念的差异是很重要的。有证据表明,重新统一后的德国社会中,性别观念的变化在持续进行。但是,作者发现,随着国家统一,东德和西德的观念并未统一。事实上,如果关注统一之后的 1991 年到 2004 年期间,东德和西德之间的性别观念鸿沟在加大。

四、阶级、阶层与社会流动研究

1.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Music in England” (《社会分层和文化消费:英国的音乐》,第1期), Tak Wing Chan & John H. Goldthorpe。作者用调查数据检验了解释社会分层和文化消费关系的三种观点,即同质性、个性化、多元/单一消费。作者对涉及三种观点的相关概念和方法论进行了注释,并强调主张 M. 韦伯关于阶层和地位区别的重要性。作者聚焦于音乐消费,并提出潜在的分层模型来定义不同类型的音乐消费;同时,通过回归分析检验了这几种类型的社会特征。从韦伯主义立场来看,与阶级相比,音乐消费的类型被证明与地位、教育更具相关性。总之,研究结果并未对同质性和个性化的观点提供多少支持,尽管存在着很多限制条件,却与多元/单一消费的观点趋于一致。

2. “Career Class (Im) Mobility of the Social-Cultural Specialists and the Technocrats in the Netherlands” (《荷兰社会文化学者和技术统治论者的职业分层(非)流动性》,第2期), Ayse Guveli & Nan Dirk De Graaf。文章区别了中产阶级内,不同等级的社会文化学者中的两个新阶层:技术统治论者和社会文化学者,以及不同等级的技术统治论者中的两个旧阶层。社会文化学者被认为更接近其他的社会阶层。如果社会文化学者阶层中确实形成了“新阶层”,他们应该越来越相近。因此,作者试图回答:社会文化学者和技术统治论者与其他阶层相比,是否在阶层内部拥有不同的模式,以及这些模式是否随着时间而改变。16个典型调查(n= 12 548)的流动性数据的统计结果强有力地证实了新阶层的划分,并表明,不同等级的社会文化学者中的不同阶层,比其他所有社会阶级中的各阶层更相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相近。

3. “Social Mobility over Three Generations in Finland, 1950~2000” (《芬兰三代人的社会流动:1950-2000》,第2期), Jani Erola & Pasi Moisio。文章建构了芬兰三代人(1950-2000)的社会流动模型。根据1950年及之后的人口普查数据,作者利用 Erikson-Goldthorpe 分类模式建立了包括八个层次的三维流动表(祖父母、儿女、孙子孙女),发现社会遗传的过程在这八种亲缘关系中非常相似。在控制了父母的社会阶层之后,孙子孙女的社会阶层有条件地独立于祖父母的社会阶层。祖

父母对于孙子孙女不存在相加效应,但是存在一些微弱的滞后影响。滞后效应导致一种更高的可能性,即服务阶层和个体农民的孙子孙女更可能仍与其祖父母辈处于同一社会阶层。这种流动的滞后影响则会导致拥有特别贫穷祖父母的孙辈在日后获得好位置的机会更少。然而,经历两代以上后,其对社会流动就基本不具影响了。

4. “Class and Political Preferences in Europe: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Trends Over Time”(《欧洲的阶层和政治偏好-时间序列的多层次分析》,第 3 期),Carlo Barone, Mario Lucchini & Simone Sarti。文章分析了欧洲国家中社会阶层和政治偏好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并使用多级模型和 logistic 回归技术检验了欧洲 13 个国家在 1976 年至 2003 年间的相关数据。在对于阶层政治长期变化的比较研究中,等级投票是最普通的指标。作者不再关注选举人的行为,而是分析被访者在一个左右量表中的自我定位数据。作者认为,当进行跨越时空的大规模比较时,这个指标呈现了相关的优势。结果证明了在时间序列中,阶级地位和政治取向之间关系的更优的稳定性。

5. “Class Clues”(《阶层线索》,第 5 期),Michael Tahlin。阶级理论对社会不平等有很多种解释方法,其中一个模型在过去十年的经验研究中占有特别的优势,即 EGP 分类法。作者根据瑞典有关雇佣关系的数据检验了这个模型的理论基础,但检验结果却否定了这个理论。工人和雇主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目前备受关注,但似乎从来没有被明确的检验)在阶级关系中明显不重要;反而,雇员的阶层优势的主要来源于工作的技术含量。这与最近 EGP 模型的理论调整有部分的一致。研究表明,未来在阶级不平等方面的理论工作应该转向模型的技术根源。这种转变是由最近阶级研究忽视的、并得到文献中的大量证据支持。

6. “Systems of Distribution and a Sense of Equity: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Meritocratic Attitude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分配系统和公平的感知:后工业社会中精英态度的多层次分析》,第 5 期),Sheri Kunovich & Kazimierz M. Slomczynski。作者使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社会不平等模块”数据,检验了前精英态度在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上的决断。根据自我收益合理性行动理论,有高教育成就和高收入的个体,被认为有更强的精英意识,因为精英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他们会在

这样的体系下获利。同时,现代化和后工业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中较高社会精英等级的人比较低等级的人拥有更多的精英意识。分层线性模型的结果分析了来自 14 个国家的 7 972 人的数据,结果指出,个人教育和收入对精英态度产生影响;也证明了即使控制了国家福利和教育储备这两个变量,社会精英等级和对此系统支持程度之间,在统计上仍是显著的。另外,作者发现在 1990 年代初,后共产主义政权对于精英的支持产生了消极作用。

五、社会资本与人际交往研究

1. “Patterns of Formal and Informal Social Capital in Europe”(《欧洲正式和非正式社会资本模式》,第 4 期),Florian Pichler & Claire Wallace。文章通过两个方面研究“正式的联合行为和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通过社会网络、社会家庭的支持(非正式社会资本);另一方面是通过伴随着社会信任的(正式社会资本)联合行为。研究运用 27 个国家的样本数据,并用两个维度给欧洲的国家分组,即他们的值是否在社会资本的两种形式中都高(补足),或者是否非正式社会资本代替了正式社会资本(替代)。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在所有社会资本的形式中都较高。在东欧和南欧,非正式社会资本更重要,但是,南欧的主要形式是家庭支持;而东欧家庭外的非正式社会资本也很重要。另外,可以用“社会资本政治制度”来理解欧洲国家中分享和凝聚的文化。

2.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and its Effectiveness: The Case of Small Entrepreneurs in Italy”(《社会资本及其效力的测量:意大利小企业家的个案》,第 4 期),Antonio M. Chiesi。作者在中观和宏观层面运用一些具体指标,分析了意大利近年来以自我为中心的小企业家网络。方法论的结果显示,网络分析技术较 Putnam 用来测量市民的、系统的信任和社会凝聚力等群组指标来说,在微观层面提供了更直接和可靠的方式来测量社会资本。结果显示,个人网络的一些结构特征及其随时间产生的变化,使得小企业家取得生意上的成功(平均状态和稳定连结),另一些特征在统计上则并无相关(密度和大小)。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需进一步的研究来探索。

3. “The Economic Side of Social Relations: Household Poverty,

Adolescents' Own Resources and Peer Relations”(《社会关系中的经济因素:家庭贫穷、青少年自有资源和同辈关系》,第 4 期),Elin Olsson。文章运用 2000 年瑞典生活水平调查和 2001 年至 2003 年瑞典生活状况统计调查的访谈数据,研究青少年(10-18 岁)经济资源与朋辈社会关系的关系。数据涉及反映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的指标,以及关于家庭收入的登记数据。分析表明,经济资源(包括家庭经济状况和青少年自有资源两方面)和社会关系肯定有联系。儿童的贫困和相对剥夺对某些尺度上的社会关系有相当大的影响。在控制了家庭特质的因素后,这些结果非常有力,且这种有效性跨性别和年龄组。分析指出,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对青少年的社会关系也很重要。

4. “Globalization,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Willingness to Help Others: A Multilevel Analysis across 26 Countries”(《全球化、社会结构与助人意愿:一项来自 26 个国家的多层次分析》,第 4 期),Ferry Koster。作者研究了在关系越来越紧密的国家中,全球化与人们的助人意愿是否相关。助人意愿在开放国家里可能会更低,是因为更相融的国家界限和更低的社会凝聚力。另一方面,国家的开放也能够增强本地结构,增加相互依赖的意识。全球化对于助人精神有何种影响,取决于国家的社会结构。多层次分析显示,经济和社会开放度与帮助病残的意愿并无关系,但是帮助外国人的意愿与经济和社会开放度有很大关系。研究指出,社会结构可以解释国家水平上的开放度与个体公民帮助外国人意愿之间的关系。一旦人们接受了更多的关于他人行为的积极信息,他们就会更愿意帮助外国人。

六、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研究

1. “Would Declining Exit Rates from Welfare Provide Evidence of Welfare Dependence in Homogeneous Environments?”(《下降中的福利退出率会造成同质环境中的福利依赖吗?》,第 1 期),Dalit Contini & Nicola Negri。文章指出,福利潜在的消极影响并不能简单地用“如果异质性被适当的模拟,退出速率的下降被归因于福利增长时的停止福利能力的累进减少”这种分析策略来说明。作者建立了一个模型,与 Bane 和 Ellwood 描述工作/失业、贫穷和社会救济之间因果联系的理论框架一致。研究实施了一个模拟研究,来表明福利退出速率中消极的

持续性依赖可能起源于某种环境,这种环境中没有什么消极影响在起着作用,甚至从过程的开始就没有异质性。因此,福利中退出速率的消极的持续性依赖并不意味着“福利依赖”,即这种格局可能是由于持续的贫穷或失业的影响。

2. “Welfare Regimes, Employment Systems and Job Preference Orientations”(《福利制度、雇用体系和工作偏好取向》,第3期),Duncan Gallie。他运用欧洲5个在政体上具有可比性的国家:丹麦、芬兰、德国、英国和瑞典的典型数据,比较了这些国家的内在和外在的职业偏好的相对强度,并试图检验在雇员的职业偏好方面的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并没有明显证据支持“生产和福利制度职业偏好有实质的影响”这一说法。国家间的差异更多的是由于劳动力成分的不同。但是,有证据支持“工作的性质对于内在的职业偏好的显著性起着作用”,不同社会制度下“对高质量工作的追求”的差异可以导致激励方式的差异。

3.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Public Attitudes to Welfare Policies”(《经济状况和对福利政策的公共态度》,第3期),Morten Blekesaune。文章试图回答“改变经济状况是否能改变公众对于福利国家政策的态度,更明确地说,对政府供应和经济再分配的公共支持在经济疲软和低就业率时期是否能够增加”。这是在政治评论员中很流行的假设,但是受制于有限的经验主义的详细审查。作者用全球价格调查的三次波动的数据检验这一假设,在控制了个人特征之后,研究者在跨地区的分析中,在国家层面上修正了这一假设的影响。这一假设得到四个被检验的影响中的三个的支持。这些影响一脉相承,而个人层面的影响只能解释一小部分。结果也显示,福利国家政策的公共意愿的形成是可以预测和推理的。

七、种族与移民研究

1. “Does the Ethnic Composition of Upper Secondary Schools Influence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and Attainment?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the Norwegian Case”(《普通高中的种族成分会影响教育成就和教育程度吗?一个挪威个案的多层次分析》,第3期),Silje Noack Fekjaer & Gunn Elisabeth Birkelund。文章用多层次的分析检验了种族成分对于

普通高中学生等级(教育成就)和他们后续的教育选择(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数据涉及 2001、2002、2003 年奥斯陆所有非职业高中毕业生,并有个人教育选择、等级、种族和社会经济背景等的详细信息。作者没有发现种族成分的消极影响;相反,在控制了学校的学术构成后发现,加入一个多种族学校会产生一些积极作用。

2. “Immigrant Concentration in Schools: Peer Pressures in Place?”(《学校中的移民聚集:适当的同辈压力?》,第 3 期),Hector Cebolla Boado。文章探究法国初中消极的同辈压力是否来源于外国人的集中。研究运用学校成就的 3 个指标:初中的学习年数、第 4 年和第 3 年的成绩、高中的选择。作者认为,如果假设社会空间中外国人的分布是随机的、外生的过程,那么多元分析可以确认消极的同辈压力。但是,如果把它认为是跨学区的预先分类机制的结果,那么很明显,外国人的集中对于学业成就的影响缺乏统计上的显著性。

3. “Trends in Ethnic Educational Inequalities in the Netherlands: A Cohort Design”(《荷兰教育的种族不平等趋势:一项同期群的设计》,第 3 期),Jochem Tolsma, Marcel Coenders & Marcel Lubbers。他们研究了荷兰种族间的教育不平等问题,集中关注同期群中最高教育水平的变化和四个最大种族与荷兰本地人之间学业过渡的区别。研究发现,在小学之后,少数民族更倾向于选择较低的发展轨迹,但是在初中,他们在职业轨迹和普通轨迹方面的选择与别人没什么不同。如果他们成功地通过了高中教育,他们选择继续接受教育的可能性比荷兰本地人更小,而大学更成了荷兰本地人的专有领地。这种教育的种族差异并非由于贫穷的社会经济背景。在一个基于阶级和性别的教育不平等正在逐渐减少的国家,基于种族的教育不平现象仍然非常明显。

4. “Next Year in Jerusalem . . . or in Cologne? Labour Market Integration of Jewish Immigrants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Israel and Germany in the 1990s”(《耶路撒冷或科隆的明年? 1990 年代以色列和德国的前苏联犹太移民劳动力市场的整合》,第 2 期),Yinon Cohen & Irena Kogan。文章集中讨论了被接受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特征如何影响了移民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和进步。运用德国 1996 年和 2000 年的户口调查数据和同年以色列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作者比较了 1990 年代以色列和德国的前苏联犹太移民自主选择劳动力市场及其整合的模式。与以

色列相比,较为严肃的德国劳动力市场为前苏联移民提供了更为慷慨的收益,这解释了初级劳动力市场的很多表现(如失业水平、就业状况)和进步的跨国差异。然而,与迁移选择的经济理论相反,作者没有发现以色列和德国的移民在教育的选择模式上的差异。

八、其他领域的研究

1. 消费社会学 “The Omnivore Thesis Revisited: Voracious Cultural Consumers”(《被重提的杂食性问题:贪婪的文化消费者》,第2期), Oriel Sullivan & Tally Katz-Gerro。他们研究了对于文化杂食性的测量,理论上是基于文化品位的尺度和贪婪的尺度,反映了基于休闲参与的范围和频率的休闲消费定量尺度。从英国的数据来看,文化饕餮在对于贪食者的分析中被证实分享更多的关系,例如,教育资格和职业的社会地位。此外,这些关系的存在不考虑个人的时间和金钱资源。由于文化饕餮与高地位的个体相关,又由于它与时间和金钱无关,研究者认为那是一个与一些观念(如被掠夺、忙碌、多任务处理或信奉不同的文化消费模式)相关的标志性的地位符号。

2. 贫困问题 “The Case for an EU-Wide Measure of Poverty”(《欧盟内贫困测量的个案》,第1期), Tony Fahey。他指出,欧盟内的收入贫困通常由每个成员国的收入限值水平来测定,未考虑成员国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因素。近年来欧盟在不断扩大,成员国之间的收入差异已经很明显,以至较富裕成员国定义的贫困线标准比较贫困成员国高出很多。作者建议,为了解决这种情况下日益增长的经验主义的政策问题,基于欧盟极限的贫困测量需要与现有的测量方法并行。客观状况和主观剥夺感的指标表明,在较贫穷的成员国中(欧盟的测量标准则会减少这一程度)的极高的贫困率有着重大的意义,它影响了最低生活标准,造成很大比例的人口产生剥夺感。另外,这些指标也关乎欧盟的政策。

3. 经典著作评述 “When Anomie Becomes a Reason for Suicide: A New Macro-Sociological Approach in the Durkheimian Tradition”(《当失范成为自杀的原因:涂尔干传统中的新宏观社会学》,第4期), Peter Graeff & Guido Mehlkop。他们指出,涂尔干的自杀论是社会学中最早把理论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典范。作者认为,根据图尔干的理论,正常

国家范围内的自杀水平和病态的自杀率是不一样的,只有后者是社会学所关心的,因为他们是社会失范的结果。最新的经验研究显示,国家范围内的自杀水平可用不被认为是社会现象的特别的生存环境(如气候状况)来解释。与之相对,自杀率的偏差是由与社会失范相关的环境来解释的。

4. 社会统计学

(1)“Attrition in Panel Data: The Effectiveness of Weighting”(《追踪调查数据中的损耗:加权的有效性》,第 1 期),Leen Vandecasteele & Annelies Debel。文章指出,虽然加权在对付社会学研究中的损耗问题上是一个常用策略,但它的效力不如它在减少损耗偏差方面明显。作者旨在通过对加权在“欧洲社区家庭的面板数据”中所起的效力的评估来填补这一缺口。在这一数据中,对社会阶层、教育的分配的评估显示出了偏差。此外,偏差的方向在不同国家间也不同。数据中纵向的加权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偏差;但出乎意料的是,有时候也会增加偏差。但是,当以一个包含更好的缺失预测的新的纵向加权代替之前的加权时,后面这种情况最大程度地被避免了。

(2)“Heterogeneity in Post-Materialist Value Priorities: Evidence from a Latent Class Discrete Choice Approach”(《后唯物主义者价值观的异质性:潜在的分类离散选择路径的证据》,第 5 期),Guy Moors & Jeroen Vermunt。他们依靠潜在分类离散选择模型确认 Inglehart 的后唯物测量方法。作者认为,从统计学角度讲,这是在处理定序数据时值得赞赏的方法。与 Inglehart 的研究一致,后唯物主义者的分类被认为与被选择的潜在分类的数量无关。但是,直到唯物主义被分为不同的三类之后,唯物主义者所关注的才变得卓著。经验主义类型学的有效性通过与关键协变量和政治态度相联系而被论证。

5. 社区 “When are Neighbourhoods Communities? Community in Dutch Neighbourhoods”(《邻里社区何时来到? 荷兰的邻里社区》,第 1 期),Beate Volker, Henk Flap & Siegwart Lindenberg。对荷兰存在邻里社区的观点进行了研究,并解释了为何有些邻里中形成的社区比其他邻里关系要多。作者提出一个假设,即人们出于对某些良好目标的期待而建立社区。一些关于当地社区建立的条件被详细列举(如机会、便利性和动机),且这些条件会在如下情形被意识到:(1)邻里之间有更多

的集会场所,(2)邻里间有动力投入他们的资源和兴趣在当地居民关系上进行投资,(3)居民在邻里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很少,(4)邻里间相互依赖。作者使用了荷兰 168 个家庭 1 007 个被访者的社会网络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在荷兰的邻里关系中,存在相当数量的社区共同体,上述四种情形都有助于解释这一情况,其中邻里间的相互依赖在解释社区形成方面具有最强的影响力。

八、书评

1. 第 1 期中由 Prof. Dr Karl-Dieter Opp 介绍了 Peter Hedstrom (2005) 所著的 *Dissecting the Social: On the Principles of Analyt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从分析社会学的角度来剖析社会》)。该书主要论述了如何以分析社会学的原则来剖析社会。评论者 Karl-Dieter Opp 分析了覆盖率模型(CLM)的不足,对比了基于机理的解释、宏观-微观解释和理性选择路径三者之间的差异,还介绍了书中的因果模型、回归分析和实证研究。

2. 第 3 期中由 Hiroshi Ishida 介绍了 Richard Breen (2004) 所著的 *Social Mobility in Europe*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欧洲的社会流动》)。该书的主要内容是欧洲的社会流动,他运用特定对象和特定指标进行测量,呈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欧洲的社会流动状况,提出了欧洲国家正在日益趋同的看法,并且把妇女纳入社会流动研究中,进行了 11 个国家的综合数据比较研究。

3. 第 3 期中另一篇评论由 Matthew Bond 介绍了 Roberto Franzosi (Ed.) (2004) 编著的 *From Words to Numbers: Narrative, Data, and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从文字到数字:叙事、数字和社会科学》)。该书的内容主要针对“从文字到数字”这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变化,但是评论者 Matthew Bond 认为作者有自相矛盾的行为。因为作者首先声明存在一些技术,可以用更少的文字和数字代替繁缛的描述,但是他本人的行文风格却证明了其本身正是华丽词藻的拥趸者。

4. 第 4 期中由 Marie Plessz 介绍了 Diewald Martin, Anne Goedicke and Karl Ulrich Mayer (Eds.) (2006) 编著的 *After the Fall of the Wall: Life Cours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st German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社会变革中的生命历程》）。该书的内容是关于德国统一后东德的变革，主要是通过研究经历了变革的人们生命历程，通过纵向分析来呈现社会的变革状况，对于研究 1989 年前后的德国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5. 第 5 期中由 George W. Leeson 介绍了 Bernhard Ebbinghaus(2006) 所著的 *Reforming Early Retirement in Europe, Japan and the US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欧洲、日本、美国的提前退休制度的改良》)。该书的内容主要针对提前退休这一制度，通过比较欧洲、日本和美国的提前退休制度，呈现了各国提前退休制度的发展和现状，探寻促进和阻碍这一制度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各国间政策区别的原因。

6. 第 5 期中另一篇书评由 Catherine Comet 介绍了 Ronald S. Burt (2005) 所著的 *Brokerage and Closure: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Capital*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回扣与终止：社会资本导论》)。该书是关于社会资本的，书中关注社会资本的两个主要来源：回扣和终止的影响及机制，通过对他们的分析来解析社会资本，提出两者对社会竞争和选择有着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李 聆